

本期专题·2019年盐城市“两会”

- 02 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八大要素
- 05 长三角一体化的“大势”
- 06 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 08 大力发展现代海洋经济，打造东部沿海新增长极
- 10 以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政坛经纬

- 12 2019 搞政策研究需要下哪些苦功夫

经济纵横

- 16 “数里行间”的政府账单
- 18 中国经济需要结构调整

文化漫步

- 18 《啥是佩奇》一夜爆红说明什么

悦读时光

- 封三 公务员周末送外卖是否违纪

编者按：又一个新的起点，又一段新的航程，2019年盐城市“两会”以其新的时代坐标而意义非凡。盐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与盐城市政协第八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简称“两会”)于1月20日至25日顺利召开。出席会议的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肩负全市各界人士的重托，认真履职，为继续深入推进“两海两绿”新路径，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盐城积极建言资政、献计出力。

2018年，全市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咬定“两高”目标，坚持“三市”战略，探索“两海两绿”新路径，着力巩固优势、补齐短板、彰显特色，经济稳健增长，转型步伐加快，开放展现新姿，生态持续改善，城乡面貌显著变化，民生福祉不断提高，全市高质量发展实现良好开局。宝武集团2000万吨“绿色、精品”钢铁生产基地正式落户，刷新了盐城项目招引的“高度”；盐青铁路建成通车，提高了盐城对外交往的“速度”；惠及500万群众的新水源地及引水工程“一主三支”全部通水，展现了盐城发展惠民的“温度”；申遗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提升了盐城生态建设的“热度”。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2019年盐城市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市委书记戴源指出，盐城未来发展的空间在沿海，出路在开放，要以“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为最大机遇，在更高层次统筹谋划沿海开放，激活沿海动能。要全力突破重大产业，围绕全产业链合作，进一步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拓展，打造转型发展新高地。要加快推动机制创新，加快投资贸易便利化改革，打造公平公正、透明可预期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要主动提升合作能级，以产业合作为纽带，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密切人文交流、畅通经贸通道，以产城融合核心区和临港产业配套区“点”的突破，带动沿海经济带“线”的隆起，实现全市开放合作“面”的形成，提升盐城在国家开放战略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本期推出“2019年盐城市两会”特刊，重点围绕“确保如期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质量发展走在苏北苏中前列”的“两高”目标，“产业强市、生态立市、富民兴市”的“三市”战略，“开放沿海、接轨上海，绿色转型、绿色跨越”的“两海两绿”发展路径，有针对性地选取相关文章，力图站在中央层面新时代、新格局的高度，借鉴全国范围内相关产业发展的经验，结合权威媒体的视角，以及专家学者、学术论坛的观点，希望能对建设“强富美高”新盐城的长远战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其他栏目的文章也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戈建虎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王智芹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邮 箱：417967615@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八大要素



高质量发展是国民经济系统从量到质的本质性演变,是由系统中的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综合推动的发展结果。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通过顶层设计、上下结合,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基础要素。

支撑要素一:非均衡战略逐步转向均衡战略

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特征,是通过把有限的资源倾斜用于重点战略部门的发展,试图用产业关联效应拉动其他部门发展。这虽然可以人为地快速推动重点部门的扩张,但是长期实施的消极后果一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容易出现“重大结构失衡”,如未列入战略和重点部门的产业和地区,会出现长期的发展瓶颈现象,而各地政府都支持重点发展的部门,会成为产能过剩的部门;二是过度强化了政府和产业政策的作用,抑制了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

转向均衡发展战略意味着我们必须扬弃过去用行政手段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转而通过利用市场机制决定资源的配置。这里“均衡”的意义在于:市场主体在利益驱动下,按照供求信号进行竞争性资源配置,就能使各产业部门获取大致平均的利润率。

而偏离这一平均利润率的任何信号,都意味着产业供求结构的失衡,都会造成资源的再配置即结构纠偏。显然这就是社会福利损失最小的高质量发展。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状态更多表现为生态环境、关键技术、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要素市场发育等领域短板或瓶颈。这与这些领域市场容易发生失败有关,也与政府过去把资源过于集中在经济市场领域、忽视对市场失败现象进行大力度纠偏有关。因为,未来实施均衡发展战略,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尤其是在非市场调节的上述领域要加大政府的投入力度。

支撑要素二:片面工业化转向四化协同发展

为加速推进工业化发展,过去我们实施了农村与城市隔离、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的种种措施。副作用是除了加剧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农村的衰退外,广大农民和城市低阶层的低收入和低需求难以消化制造业的巨大产能,结果便发生了严重的过剩产能,或者只能通过廉价出口甚至补贴出口去消化,很难有高效率、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从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动“四化协同发展”开始,即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中国的发展战略开始突破工业片面发展的格局。如,为了消除城镇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的痼疾,开始以城镇化拉动工业化;用信息网络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增强工业的智能化水平等等。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过去说,要全面构建现代农业基础、发达的制造业以及门类齐全的现

代服务业,这其实是分割而不是融合了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缺乏等量资本在部门间获取等量收益的均衡协调发展理念,很容易在原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片面突出发展某个产业部门,形成产业间的结构撕裂。建设四位协同的产业体系,从要素投入角度而不是部门分割的角度,明确了未来创新引领、产业协同发展的总要求。

支撑要素三:要素市场化配置成为进一步市场取向的重点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经济转轨的重任并没有彻底完成,主要体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在要素市场配置中,发展得比较彻底和充分的主要是货币、技术、信息等市场,而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还不够完善。这样,结构调整便会遇到一些困难,如劳动力市场的刚性会使国有企业在产能过剩时成为僵尸企业;资本市场中的收购兼并功能不充分,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调整就会比较困难;结构调整的困难是,高质量发展的天敌会造成资源的低效率利用。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调整产业结构是化解产能过剩、消灭“僵尸企业”的主要途径,是纠正资源在产业内配置失误、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的主要措施,即通过产业内企业间关系的重组,以及资源在企业内的重组,使资源在产业内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加速移动和有效配置,从而提高供给结构、需求结构的水平和能力。

清除“僵尸企业”,化解产能过剩,需要尽量避免直接破产,避免运用激进的手段制造人为的社会冲突。为此,要素市场化配置要利用资本市场的内在功能,通过两类机制来实现:一是主动性调整机制,即通过鼓励企业间的收购兼并,消灭低效率、产能过剩的企业;二是被动性调整机制,即由市场倒逼、企业为主体,放任市场机制自动和自我调节,让产能过剩企业自生自灭,由此实现市场自动出清。

支撑要素四:在效率基础上实现共享分配

在高速度发展阶段,初次分配讲效率优先,再分配适度考虑公平。但是这一分配原则长期实施,必然

会导致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和财富拥有结构的失衡。据统计,1979年中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是0.16,1988年是0.382,1997年是0.458。到了21世纪,这个数值一般认为在0.5—0.6,贫富差距非常大了。

初次分配也要讲公平,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财富在国内居民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分配。GDP中外资拿得多,自然本国居民就会拿得少。依靠吸收外资来发展经济的地方,普遍都存在这一分配失衡的问题。二是财富在资本所有者与打工者之间的比例。创业的人多,居民富裕程度就高。再分配更要讲公平。如,财富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政府和企业从财富总盘子中拿多了,居民就不可能很富裕。

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弱,虚拟经济就会过火,善于和敢于利用金融杠杆、敢于炒作资产的地方,往往要比单纯做制造业的地方富裕。这造成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之间不成比例。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无论分配和再分配怎么进行调节,一个正常的社会都需要鼓励生产性努力,这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提高GDP中的含金量。

支撑要素五:找准产业优先与地区优先平衡点

产业政策优先意味着资源配置主要取决于效率导向,但这在空间上会产生歧视效应。那些区位条件较差、运输成本相对较高的地区,就不容易被纳入产业政策的发展眼界中。长期实施这一政策虽然有助于加快发展,但是会累积越来越严重的区域发展非均衡问题,从而导致极大的社会压力。地区政策优先的主要基准是地区间发展的公平主义取向,一些发展条件较差的边远地区、资源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在实施这一优先原则时将得到优先发展。

显然,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地区优先的政策取向是损害静态效率的,但是在动态、全局意义上并不一定。高质量发展是一种综合多元的评价标准,因此,对应它的最适当的状态是找准产业政策优先与地区政策优先的平衡点。主要的平衡措施有:

一、主要以发展城市群落的政策来促进乡村振兴。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尤其是城市群落发育比

较成熟的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其乡村现代化步伐也快,地区间均衡发展程度也高。

二、可以通过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办法来均衡区域和产业的关系。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按照经济区域来自布局的。它的一个直接效应是可以模糊行政区的界限,拉动产业集群内所涉及的若干行政区共同协调成长。

三、有意识地加速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各行政区拆除行政壁垒,制定统一协调的竞争规则,相互之间竞相开放,这种一体化机制将产生从极化到收敛的“非均衡—均衡”发展效应。

支撑要素六:把生态环境内化为经济发展财富

高速度发展阶段把对环境的整治和保护支出作为成本因素考虑,而高质量增长阶段把环境当成发展追求的目标,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环保支出是实现财富增长的手段。在绿色 GDP 的核算上,就要从国民生产总值转向国民生态产值,即把环境的损害作为国民财富的减少来对待,把对环境的投资和支出当成国民财富的一个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在地区之间要建立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可探索实施两类交易制度:一是建立和健全以单位 GDP 能耗为基础的节能交易制度。在这样一种省一级的节能交易平台上,单位 GDP 能耗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可以卖出相应的节能量;而单位 GDP 能耗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则必须买进相应的额度。显然,实行这一交易制度有利于促进各地区能耗量的持续下降。

二是建立和健全某流域以水环境质量为基础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具体是对水质达到一类水标准的地区,达到程度越高、比例越高则奖励越多,而对三类尤其是四类水质比例高的地区,实施惩罚性倒扣。

这种制度安排尤其适用于具有上下游关系的区域生态补偿关系。建设美丽中国需要这种把环境保护的倒逼压力转化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制度,必须把目前限于工作层面的倒逼机制提升到政策层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

支撑要素七:建设基于内需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过去开放型经济道路走的是出口导向的全球化。1992年之后,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国际贸易额呈现暴发式增长。2008年之后,世界金融危机显示这种性质的“全球化红利”已经基本结束,中国需要与世界进行再平衡。

这个再平衡就是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及时主动地启动“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战略。“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并不是一个新现象。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它的最终需求规模一直处于全球最大的地位,强势的国内市场需求加上其他非经济因素,塑造了长期的强势美元地位,诱使全球生产要素向美国流动,导致了全球其他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对其进行大量的出口,使美国可以成为吸收全球高级要素力度最大的国家。因此,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要在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基础上,强调利用全球的优质要素发展自己。中国尽早启动这一战略,也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以不断增大的内需来扩大进口,也能起到促进中国经常项目收支平衡的主要作用。国家领导人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即将相当幅度地降低过去对某些产品的关税税率,努力增加人民群众需求比较集中的特色优势产品进口。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期望能够用中国的内需吸收外部世界的先进生产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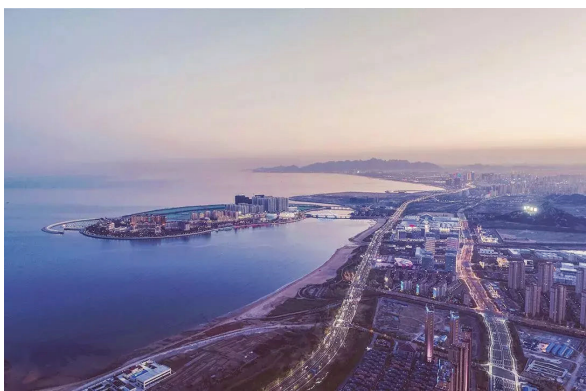
支撑要素八:高质量的制度供给能力

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核心问题,原因在于相关制度的失败或者失效。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要重点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和素质性的矛盾和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硬化所有权的约束,即预算约束硬化,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效率基础。

二是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地方政府机制,要求把为增长而竞争的旧式地方政府运作体制,通过输入新的高质量目标函数,改造为适应新时代、解决新社会主要矛盾服务的新体制。(下转第7页)

长三角一体化的“大势”



长三角一体化正成为未来发展的一个“大势”。借用《南风窗》此前的论述,所谓“大势”,即“国家治理变革正对地方的改革创新提出新要求,区域一体化正是一个突破口”。一般而言,人们偏爱从城市化角度来看待区域一体化问题,因为这是符合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但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背景下,这个一体化进程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应当说,这个一体化进程是非常快的,而它的起点又是很低的。在改革开放之初,上海市一地的GDP就占了全国较大比重,比很多省的GDP还高,而市场和金融的萌发,也让上海长期以来都保持了“经济领头羊”的位置,直到后来才被体量更大的广东省超过。但至今,上海市的人均GDP仍在大陆省区里独占鳌头,其开放程度与资本繁荣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动态。

因此,随着上海这块“大蛋糕”越来越大,辐射能力越来越强,必然吸引周围更多资源加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区域。但长三角一体化与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的一体化还有很大不同,珠三角有广州、

深圳两颗“双子星”城市,而京津冀的内部发展状况则千差万别,北京对周边资源、人才和资本的虹吸效应明显。长三角一体化的中心城市是上海,但南京、杭州两大省城的崛起速度也毫不逊色于其他地区的中心城市,而苏州、无锡等非省会城市也有很强的发展势头。因此,长三角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但上海的“领头羊”位置始终不会得到挑战,这就形成了区域内的一种动态平衡,有助于区域合作与分工的明确与和谐。

除了城市化的因素,还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问题。区域治理状况一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这不仅包括经济的发展状况,还包括民生问题、文化因素,如果社会保障不完备、民众获得感不高,很难说这个“发展”是健康合理的。长三角一体化面对的现实问题,就在于如何创造性地发挥区域优势,给全国的区域合作建立一个标杆和榜样。

譬如,长三角正在尝试的医保互通之路,就是让区域内的民众享受发展福利的重要动作。上海市拥有丰厚的医疗资源和社会保障水平,但周边地区的民众尤其是农民、城市农民工仍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关乎民众身体健康的事情,正是民生福祉所在。这个举动意味着长三角一体化会带来更多民生福利,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民众都会享受到优质资源的辐射。有了这样的保障,才能更好地谈及经济改革,因为社会繁荣指标绝不能缺少民生一项,而长三角一体化在此问题上的探索已经走到了全国前列,值得其他区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后效仿学习。

(2019年2期 南风窗)

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 11 省市,集聚了全国 40%以上的人口,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超过了 45%。自 2016 年 1 月 5 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以来,沿江各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为指导,坚持保护与发展并举,经济与民生并重,动真格、出实招、求实效,确立共抓大保护的格局,完善相关规划政策体系,加快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聚焦民生改善重点问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断提升。未来,长江经济带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如何做好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这篇大文章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绿色发展成效显著

3 年来,沿江各地严格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做好加减法,重点诊治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实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建立长江大保护的长效机制。湖北省“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秦尊文表示,3 年来,长江经济带发展取得的最大成效是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从原来的“大开发”转向了“大保

护”,“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成为共识。

在重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波看来,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此,各地已达成共识。他提出,要通过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推进沿江各地产业结构布局更加合理,发展方式更加集约,进一步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认为,各地应巩固长江经济带环境修复的成果。在产业结构上,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清洁生产和循环化改造,淘汰一批潜在环境风险大、升级改造困难的企业,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引导企业向园区集中,实现产业集聚发展,进一步建立具有高效的生态功能和经济效益的网络化产业生态平台与基础设施,形成贯穿整个流域的产业生态系统。

寻求差异化协同发展路径

3 年来,长江经济带发展取得的另一大成效是一体化扎实推进。秦尊文告诉记者,由于长江经济带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差异很大,一体化是依托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进行的。

沿江三大城市群在各自发展过程中要结合所在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做好差异化协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潘家华表示,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且生态退化和污染情况严重,在发展中面临着生态修复、污染治理等多重压力。因此,推动长江经济带东中西“一盘棋”,必须要求东部地区为中西部地区提供技术支撑,要把优质资源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而不应将淘汰落后的产能转移到中西部



地区。

秦尊文表示,一是要明确三大城市群各自发展目标。长三角城市群要建设面向全球、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世界级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要建设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城市群,成渝城市群要培育引领西部开发开放的国家级城市群。二是要明确龙头城市的功能定位。三是要协同推进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四是要联手打造中国国家经济地理横轴。以上海、武汉、重庆为“三核”,形成“国家经济地理横轴”,使得长江经济带不仅成为中国经济驱动轴,也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成长春认为,有效解决长江流域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应协同推进地方城市群融合发展,形成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大力支持园区跨域共建、产业飞地等合作方式,推进产业有序转移、产业链对接,协同推进产业园区共建,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协同推进交通软硬件建设,优化长江综合立体交通体系,以大区域枢纽为节点,完善综合交通网络。

谈到如何将长江经济带发展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典范问题,张波表示,首先要赋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能够在更高层面上协调沿江城市发展;其次要认识到各大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在国家规划的引领之下,也会因为市场的调节而不断变化。

汇聚高质量发展动力

3年来,长江经济带以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升;3年来,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有序推进,一批特色小镇、小城镇建设稳步推进、初具规模;3年来,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加速形成,为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动力。

潘家华认为,高质量发展有四个指标:一是要有经济的增长,而且对环境没有破坏性影响;二是要有就业的增长;三是要有相应的公共服务保障;四是资源利用效率高。经济社会各方面协同发展,才能称为高质量发展。此外,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若想实现高质量发展,还应引导人才“回流”,通过政府和市场保障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提升人力资本,大力改善营商环境。

张波认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关键的是创新,要通过全面创新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尤其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推动长江经济带从粗放式发展方式转变为内涵式发展方式。

成长春表示,应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明确各部门职能分工,打破行政壁垒限制,建立区域“多规合一”体系。依托长江经济带区域人才、智力密集的优势,加强创新基础平台建设,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并将东西部产业发展对接起来,推进区域产业转移与合作,合力建设覆盖长江经济带互为补充的全域产业链,构建有机高效经济体。同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建立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绿色发展。(2019-1-18 中国社会科学网)

(上接第4页)

三是产业政策要让位于竞争政策。旧式的产业政策的实质是通过制造所有制歧视、产业歧视、内外经济主体歧视、地域歧视等,实现非均衡的快速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化,需要把它逐步过渡到公平竞争取向的竞争政策。

四是法治化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竞争政策为导向,还要求实施自由进出

市场的反垄断政策,这对鼓励高质量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市场竞争中企业自由进入,是打破已有企业的市场垄断的最锐利武器,因而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政策工具;加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管,是规范市场运行的主要手段,也是保护各方利益主体正当利益和市场运行的基本要求。

(2018-8-9 经济参考报)

大力发展现代海洋经济，打造东部沿海新增长极



当前，我省发展现代海洋经济面临着海洋经济总量规模偏小、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通过大规模围填海发展临海工业的传统思路已经走不通，发展现代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我省沿海地区发展的必然路径。为此建议：1. 大力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鼓励发展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加快发展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业，推进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培育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2. 优先发展涉海金融服务业，培育发展海洋旅游新业态，提升发展海洋公共服务业，做大做强海洋高端服务业；3. 拓展渔业发展空间，重点支持远洋渔业发展，积极发展现代海洋渔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对于我省特别是沿海地区来说，最大的优势在海洋，最大的潜力在海洋，最大的希望也在海洋。我省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提升海洋科技创新水平，集聚创新要素，大力发展现代海洋经济，打造东部沿海新的增长极。

一、发展现代海洋经济面临的问题

我省沿海地区现代海洋经济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主要表现为海洋经济总量规模偏小、海洋

产业结构不合理，由于国家海洋管控趋向严格，通过大规模围填海发展临海工业的传统思路已经走不通。

1. 海洋经济总量规模偏小。近年来，作为海洋经济核心区域，我省沿海三市发展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总体上未彻底摆脱全国“洼地”局面。沿海三市海洋产业大型龙头企业不多，重特大项目偏少，特别是进入产出阶段的“百亿级”项目不足，对海洋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效应不明显。与沿海兄弟省份相比，我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基础薄弱，总量规模偏小，2016年南通和连云港两市海洋生产总值之和还抵不上山东青岛市。

2. 海洋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我省海洋服务业总量较小，2015年沿海地区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增加值仅分别相当于广东沿海地区的14%、34.7%、12%。我省海洋服务业比重不高，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地区海洋服务业占比均超过55%，而我省仅为48.2%。与此同时，虽然我省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大于15%的年均增速发展，但因起步晚、基础差、规模偏小，尚未成为海洋经济发展重要增长点。

3. 海洋管控机制趋向严格。2016年底以来，中央先后通过三个文件，其中《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在管理体制上强化了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的统筹协调，在管理方式上确立了以自然岸线保有率目标为核心的倒逼机制，在管理手段上引入了海洋督察和区域限批措施；《围填海管控办法》是全面加强围填海管控的纲领性文件；《海域、无居民海岛有偿使用的意见》对可开发利用的海域、无居民海岛，要通过提高用海用岛生态门槛，完善市场化配置方式，加强有偿使用监管等措施，建立符合海域、无居民海

岛资源价值规律的有偿使用制度。三个文件的出台,表明依靠围填海来发展临海产业的传统路径走不通了。

二、发展现代海洋经济对策措施

针对我省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下一步,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加强政府引导,通过大力发展现代海洋经济,促进海洋经济质量和总量双提升。

1. 培育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推进海洋产业关键技术突破,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是要大力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推动海洋工程总承包和专业化服务,提高海工装备总装集成能力,重点加强启东海工船舶工业园、东台海洋工程特种装备产业园等载体建设,带动和引导一批中小型企业走专业化、特色化发展道路。二是要鼓励发展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重点支持连云港海洋生物制药创新基地、盐城海洋生物产业园、省海洋药物研究开发中心等建设,发挥省海洋生物产业技术合作联盟作用,开发绿色、安全、高效的新型海洋生物功能制品,推进海洋生物制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创新药物研发及产业化,打造完整产业链条。三是要加快发展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业。优化沿海风电开发布局,发展深水区风电,加快建设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推动海上风电设备关键技术攻关,构建集技术研发、装备制造、风场应用和配套服务于一体的海上风电全产业链。同时,积极开发利用潮汐能、波浪能、温差能、盐差能等海洋新能源。四是积极推进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开展海水淡化项目纳入市政饮用水工程试点工作,大力推广直接利用海水作为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推广应用海水循环冷却。研发和生产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海水淡化设备、海岛用海水淡化及海水综合利用设备,提升以“风水电一体化”为主的海水淡化成套装备产业化水平,加强海水淡化设备在淡水匮乏的海岛、沿海国家和地区推广应用。

2. 做大做强海洋高端服务业。一是优先发展涉

海金融服务业。推进组建江苏海洋发展银行或沿海开发银行,积极组建江苏省海洋投资有限公司,集中支持海洋经济发展。发挥省沿海产业投资基金、“一带一路”投资基金与沿海市县投资基金的联动作用,设立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加快推进海洋新兴产业、高效生态海洋渔业等项目落地。推动开展已建和在建船舶抵押贷款、预付保函等金融业务,试点开办码头、船坞、船台等资产抵押贷款业务,拓展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仓单质押、供应链融资等多种抵质押融资方式。二是培育发展海洋旅游新业态。目前,我省海洋产业发展主要是在岸上,下海不够,如“海洋”旅游多半停留于“滨海”旅游。要培育发展邮轮游艇旅游。通过学习上海、深圳、厦门等地发展邮轮、游艇旅游的经验,尽快论证建设邮轮游艇码头,开辟日韩等航线,到达日本的福冈、鹿儿岛、神户和韩国的济州岛等比较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带动餐饮、交通、公共服务、维修保养及配套等协同发展。要培育发展海岛旅游。连云港拥有江苏最主要的海岛,连岛、秦山岛、前三岛等旅游潜力巨大,要加快开发海岛休闲度假旅游产品,组织海岛一日游或两日游。选择海岛及近岸海域适宜开展海洋运动的区域,开发航海体验、海钓、帆船、海岛探险等海上运动以及沙滩运动、卡丁车等海滩运动和海上拓展运动,发展海上垂钓。依托海洋牧场建设,组织海钓比赛等休闲观光项目,推进海洋旅游从近岸向海上转移、从观海向亲海延伸。三是要提升发展海洋公共服务业。发展现代海洋航运服务业,支持船舶交易、船舶经纪和管理、海事仲裁、邮轮服务等,开展保税、国际中转、国际采购等业务,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开展国际性海洋多边合作等。

3. 优化提升现代海洋渔业。在海洋渔业方面,沿海三市要向东、向近海、向深海拓展渔业发展空间。在潮上带和潮间带的高潮区发展高涂蓄水养殖贝类的生产模式,在保证养殖者受益的同时,开辟人工培育贝类苗种的新途径。在潮间带推广使用玻璃钢插杆养殖紫菜,提高抗风浪能力,扩大养殖面积。在潮下带和近海,开展深水网箱养殖和智能渔场建

以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建设长江经济带，必须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现实地看，推动产业绿色发展是破解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约束的重要突破口，是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的重要保证，也是当前急需探讨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向“绿”转型的主要困难

当前，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实现绿色转型，主要面临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是产业结构“偏重偏化”特征明显。采矿业等资源型产业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重要产业，尤其是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对采矿业依赖程度较高。采矿业及其相关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损耗资源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与此同时，高污染型产业在长江经济带占比较高。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



和电力等项目密布长江沿线，部分重化工产品产量庞大，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占有重要地位。目前，部分重化项目仍采取较为粗放的生产模式，工业能耗、物耗和污染水平居高不下。

二是产业布局不合理。一方面，长江经济带产业布局与资源配置错位。当前，沿江各地都提出了各自的沿江发展战略，强调布局更大的项目和产业园区，追求大投资、高产出，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布局与资源、要素和市场现状不相适应，企业的相关布局亦与实际脱节。同时，长期以来形成的上中游地区的能源产业和下游地区的能耗型产业集中布点，进口原油西运加工，毛、麻、丝等天然纤维原料东运生产，这些都大大增加了资源环境承受的压力。

另一方面，部分沿江地区产业布局同质化严重。长江沿岸有几十万家化工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环境承受能力，一些污染型企业距离居民区和江边过近，部分企业环保措施仍不到位。同时，一些地区排污口、港区、码头与取水口布局不合理，也存在诸多风险和隐患。

三是工业企业对污染治理的投入不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对污染治理的投资力度更大，但就其绿色发展的实际需求看，仍显

设，借鉴挪威的经验做法，论证建设集先进养殖技术、现代环保养殖理念和世界顶端海洋工程设计于一身的海上养殖装备（海上养鱼平台），低密度、生态化养殖大黄鱼、三文鱼等附加值高的鱼类品种，推动从传统人工式养殖向自动化智能化立体养殖转变，提升现代海洋渔业发展水平。要重点支持远洋渔业等战略性产业，加快建造大型专业化南极磷虾捕捞加工一体化远洋捕捞渔船，由近海捕捞向公海、过

洋，向南极周边海域拓展。策应“一带一路”建设，积极输出养殖技术和加工能力，突破美国、印度、老挝、缅甸等海外渔业养殖与加工基地建设。重点推进海门南极磷虾产业园、海峡两岸（射阳）渔业合作示范区、赣榆海洋食品精深加工基地等建设，提升我省新型海洋食品及生物制品产业的总体实力。（作者：张建军，省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省智慧海洋联盟理事长）

（2018-10-15 江苏省社科联网站）

不足。近年来,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对企业盈利能力造成较大压力,企业对节能减排的投入动力不强。如何更好处理实现绿色转型与保持稳定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长江经济带沿线企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化解症结的着力方向

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构建层次分明、优势突出、生态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下一步应朝着这个方向切实发力。

一是进一步优化制度供给。当前,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工作仍受地方政府的成长偏好、财税体制和不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等因素较大制约。对此,必须沿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推进相关工作,采取最严厉的环保规制,制定长江经济带统一的产业目录,明确限制、禁止、淘汰产业清单,协同控制高耗水、高污染、高排放工业项目新增产能,倒逼企业加快科技创新与产品升级步伐,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绿色制造的技术水平。需在深入开展税收体制改革、调整沿江重化工布局 and 结构,以及优化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布局等方面寻找良策,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是切实推动和加强区域合作。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统筹规划、联动发展。在思想认识上形成“一条心”,在实际行动中形成“一盘棋”,统筹研究长江流域总体规划、重大产业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减少沿线产业无序竞争,提升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加快形成“协调性均衡”的发展格局。同时,沿线省市还应协同加强流域生态系统修复和环境综合治理,协同实施联防联控政策,在打造一条“生态走廊”的同时,建设一条“经济走廊”。

三是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各地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慎用、巧用政策手段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深入推进生态长江法治建设、建立健全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相关机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机制和补偿机制上下足功夫。

推动转型的突破口

首先要聚焦科技创新。应提高绿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充分认识绿色技术的正外部性,通过技术标准、排污税费、补贴等政策工具,激发企业对绿色技术的应用需求,改变绿色技术产品需求不旺的现状;通过征收资源环境税等措施,促进资源环境外部性内部化,提振企业对绿色产品的需求。

同时,还应大力宣传生态文明理念,让全社会参与并监督绿色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营造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的社会氛围。

其次要优化产业结构。一是改造升级传统制造业。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运用市场化手段淘汰和转移过剩产能。二是培育发展新型高端制造业,依托重大项目和专项工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高加工度和高技术密集度产业。三是做好长江经济带产业布局,完善产业链配套,打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等世界级产业集群,实现产业、城市融合发展。

同时,积极构建沿江区域创新体系。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一批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龙头企业,立足长江经济带的智力优势和重点产业,加强统筹规划,新建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实现跨机构、跨地区的开放运行和共享。支持建设国家地方联合创新平台,探索建设工业技术研究院等新型研究机构,在沿江重要节点城市建立一批成果转化中心、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和产业专利联盟,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全国创新示范区。

再次要重视园区建设。一方面应推进园区绿色循环发展,从生态产业、生态工业园、生态城市和生态流域等不同层面推进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优化工业园区布局,加强企业、园区、行业间的原料互供和资源共享,减少生产流通环节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健全源头节约、循环利用、安全处置全过程的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循环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要提升园区生态环境保护水平。提高开发利用岸线使用效率,合理安排沿江工业与港口岸线、过江通道岸线、取水口岸线。推进国家级承

2019 搞政策研究需要下哪些苦功夫



1月12日，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在第二届上海国际金融论坛上发表对经济政策研究的思考，围绕“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三者间的差异”“当前政策研究中的问题分析”和“企业家怎么看经济学家”三方面进行探讨。以下是现场实录节选：

一、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三者间的差异

今天，我想讲讲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讲经济政策研究中的方法问题。经济理论指什么？指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对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抽象概念，把概念形成知识的

体系，进行逻辑的演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等等各种经济学流派理论，都是相对独立完整的理论。尽管各种理论不尽相同，但分别都是自圆其说的一套理论体系，是概念的演绎、逻辑的自洽。当然有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如供需问题、市场问题、分工问题，大家都有共识，不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普适性的。

经济政策指什么？是意味着一个主权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经济秩序作出的制度约束，即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每一项制度约束的制定者，其主观上背后可能都受这样和那样的理论学说的支撑，但是它本身不是理论。我们说供给侧改革，这个说法体现的是政策措施，有具体制度性要求的内容。但这个提法出来以后，大学的教授、社会上的学者，纷纷对供给侧改革行各种各样的理论解说，有里根的供给学派，也有我们自己解释的新供给理论等。

所以我说政策制度和理论不是一回事，尽管政策制度背后往往受制定者脑子中这样和那样理论的影响和支配，但政策是结合了一个国家一定市场条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以开发区、产业园区为载体，加快提高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水平。统筹要素资源，加大对工业园区绿色发展的扶持力度，优化制度环境，深入推进园区和行业环境整治联动，引导企业自发地在循环经济、清洁生产、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等领域加大投入。推动沿江特色工业园区的绿色发展，促进同类产业的集聚和整合。鼓励沿江园区跨江融合，发展飞地经济，发挥特色工业园区在区域

发展中的引领和辐射作用。

第四是强化环保约束。对标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要求，出台工业节能环保标准，严格执行节能环保法律法规。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加强沿江科技成果培育申报，加强科技平台建设和管理，鼓励建设环保产业技术联盟，完善节能环保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更好推进节能环保技术成果产业化、工程化。（2018-3-1 经济日报）

件下作出的制度规范,是把抽象理论时舍去的具体情况,在制定政策制度时候又放进去进行的思考和选择。政策往往不具有普适性。

政策操作是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政策制度实际执行中的现象、现状。相对于理论而言,谈不上是严格的思维活动,它是实际活动的表现。一项好的经济政策制度,由于受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因素影响,同样有可能得不到很好的落实。对于这点,我想大家是赞同的。基于对上述概念认识的基础,我认为我不是经济学家,起码不是纯理论经济学家。我一辈子一直从事的是经济金融政策制度的研究,可以叫政策经济学家、应用经济学家。作为经济政策研究者,不管你是来自何方,最后都要看你在献计献策方面的功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功力。

搞政策研究的,了解以上三者的差异很重要。一是要清楚地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的落脚点是什么?一周前我在上海出席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发言,我很清楚我是通过分析,最后重点在讲政策建议,在讲制度、政策应该怎么调整,而不是讲理论,不是在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至于背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新古典理论,还是凯恩斯理论,没有直接的关系。

二是如果落脚点在中国经济的政策制度研究上,那么需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现状与特征是什么?与外国有什么不同?实际执行力又是什么情况?譬如,面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逆周期调控是必然的。对于融资难问题,央行其实是放松了银根。上面非常重视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有的基层银行是怎么做的呢?现在他们也积极给中小企业贷款,但给的往往是好的中小企业,而这些好企业并不需要贷款,或者说不需要那么多贷款,怎么办?银行就说你拿着吧,企业还不敢不拿,否则以后还要不要跟银行打交道?民营企业拿了贷款以后没有用,自己又去放贷给别人了,这是融资难的问题。

就解决融资贵的角度说,银行的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4.35%,有的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利率降

到3.5%,统计报表汇总到北京一看很漂亮,贷款利率降低了。实际上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后,要求你不能乱用,你必须反过来买银行的理财产品,或者告诉你,你拿了我的贷款,必须买某个地方发的理财产品,当然利率肯定是高于3.5%。对民营企业来说也无所谓,反正白赚了一点利息,捞到了好处。对银行来说走了一圈账,完成了上级任务,降低了利率。其实一切都没变,但银行企业两相其美,何乐而不为。这样的现象尽管不是普遍现象,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什么?是政策制定错了?还是说执行中出了问题?

由此启发我们,中国在整个体制转轨时既讲市场机制又讲行政干预机制,两者的最佳搭配体现在某一项具体政策上,应该有什么样的约束条件?需要另外有什么样的制度做补充等等,这是搞政策研究需要下的苦功夫,是真本事。现实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讨论所能解决的,也不是看几本书能搞懂的。中国这么大,如果落脚点是研究中国的政策,你必须要了解中国长得什么样,是什么状况。

三是改革开放的主体方向是市场化、全球化,40年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渐进改革的策略,是兼顾了稳定、发展、改革三者之间的关系。落实到政策研究层面,背后又没有动态演化的现成理论可作参考。流行的多是各种均衡理论及其衍生的周期理论、危机理论,对我国复杂的渐进改革策略都不能做出很好的理论解释。当然经济学界有动态演化理论,但这个又不被主流所承认。那么我们做政策研究的,应该怎么做?

我曾在8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当时年轻,血气方刚、热血沸腾,出谋划策搞改革,一心想把西方市场机制的东西搬过来。但搞中国的现实政策研究,最忌讳的是用其他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度中的指标、比例、数据,简单地套用到中国。比方有人说,美国间接融资比例多少,直接融资比例多少,他们这样,我们也要这样。那你怎么干?怎么样在短期内把直接融资譬如干到60%或70%?中国为什么一下子干不过去?什么原因?是金融的原因?市场的原

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是需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去研究。

二、当前政策研究中的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 40 年取得了伟大的成绩。14 亿人口，连续 40 年，年均 9.5% 的 GDP 增长，确实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这是西方经济学家也一直在说的判断，这个奇迹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国的成绩确实是历史性的，但是同时中国又处在“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危和机共生并存”的时期。那么对政策研究者来说，必须对该时期的经济事实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准确的把握。危和机共生，“机”往往好理解，说的也很多，“危”到底怎么理解？这涉及到对这几年来经济基本走势的正确把握。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部署 2018 年到 2020 年三年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重大任务时指出，要重点打好三大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三大攻坚战简单讲，一是防污染，二是脱贫，三是防风险。

我一直在宣传，三大问题，第一是污染，污染是讲什么问题，是讲人和自然界的的关系问题，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经济领域的工作，当然治污染要花钱，又涉及 GDP 的增速，但就本身而言，不是经济工作本身。第二是脱贫，3000 万人贫困问题要解决，也会涉及到资金，但严格讲，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是社会学的问题。第三个，中国经济领域的事太多了，为何唯独说要防控重大风险是攻坚战？这是 2017 年 10 月讲的，但是当时社会上不敏感，媒体也没有突出报道。到年底的 2017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一次明确地指出，“防控重大风险，就是防控金融风险”。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是高度的重视，提法是史无前例的。三大任务如果没有完成好，涉及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得不到人民的认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进入 2019 年，矛盾还是这些矛盾。我认为，2018 年的经济工作，第一个维度是通过供给侧改革，新旧动能转化，稳定经济增长，第二个维度就是慢慢释放

风险，同时守住风险底线，简单讲就是要抓好稳增长和防风险这一主要矛盾。进入 2019 今年，形势发展会怎么样？内在趋势性的发展逻辑仍然没变。宏观与微观的变化，使得 2019 年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面对这个背景，对我们的政策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

1、在宏观上首先毫无疑问必须稳住，必须在容忍经济增速有所下行时也要稳住，稳住就是要防止断崖式的下跌。为此必须采取鲜明的逆周期调控，松货币、松财政。但是当前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在下降，怎么松？松多少？松不到位意味着什么？松过头了又意味着什么？这个分寸怎么掌握？具体如何看 M2、信贷、社会融资总量这三项指标？又如何处理好这些指标与汇率、外储的关系？

2、面对投资中制造业投资的动力不足，房地产投资又不敢轻易放松，那么补公共产品的投资短板，是当前稳经济的重要良策。但是政府的公共投资效率在下降，地方债务风险问题又很突出，地方债务风险怎么防？这一切基层地方政府可以不考虑，但搞宏观政策研究的，这种“狗抓耗子”的事该管还必须管。

3、当前稳经济是必须的，货币总量的松政策怎么和释放部分风险，守住底线的要求相结合，应该出台怎么样的具体政策？

4、中央提出的“六稳”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稳预期。这是去年年中提出，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一次提出。这是对经济工作的全面要求。

六稳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我在上海的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发言时说，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预期看，不成问题，这是从纯经济逻辑分析。因为讲增长理论，需要讲增长的供与需因素。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说明我们经济增长有资金。40 年改革开放的积累，我们又积累了巨大的人力资本，包括庞大的民工队伍的技能，再加上潜在的制度改革红利，这三项因素构成了中国长期增长的供给潜力。有供给没有需求不行。从需求因素看，中国已经是一个第

二大世界消费大国,中产阶层有3亿人口,并还在扩展,说明有大量的消费需求。而且消费在升级,到日本“买马桶盖”、体检消费等等,说明中国的消费潜力又很大。中国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严重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从长三角、珠三角往中国西部走,发展需求很大。另外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需逐步缩小。这两大差距决定了中国还有很大的内需市场。供给和需求因素相加,中国经济长期不成问题。

现在的关键是短期有问题,但长期是由短期连接起来的。短期问题不解决,泡沫没有破,风险又在慢慢释放,与此同时外部压力在加大,经济进一步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六稳,非常重要。问题是,六稳之间的逻辑是什么?我曾说,稳就业、稳金融,取决于实体经济中的稳外贸、稳投资、稳外资。外贸、外资、投资不稳,自然就业就稳不住。外贸、外资,投资减少,曾经签的这么多的契约不能履约,不能继续维持,一大批企业的资金链将中断,从而金融体系就稳不住。但是要稳住外贸、外资和投资,必须针对我刚才说的形成2019年新的更加复杂更加严峻的原因,对症下药,即针对宏观调控效应边际下降,微观活力明显不足的情况,立刻采取短期内能立竿见影的调整政策。否则,老声常谈书本知识,就不足以稳市场、稳民心,进而不足以稳大局,守底线。

三、企业家怎么看经济学家?

马云最近在浙商上海论坛上讲,“90%的人在埋怨宏观经济,但是90%倒下去的企业跟宏观经济无关”。马云还讲,“我们公司做的最好的时候,是我关心世界的时候,当我关心我们自己,公司的形势就好起来”。我还记得马云还曾讲过很多很精彩的话,譬如:企业家不能完全听信经济学家的。假如企业家去听经济学家的话,一半就死掉了。这些话具体在哪里讲,我没查到,但我总的感觉,马云的讲话很生动、很实在,也很智慧、很哲理。我以前每次对企业家讲课或发言,讲到最后我也常说此类的话,即我以上讲的很多,你们不一定完全听我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宏观是宏观,微观是微观,微观是你要做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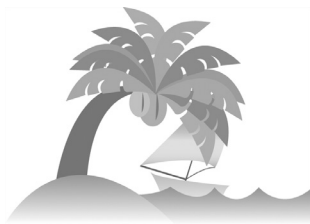
的事。为什么这么说,下面讲两点意见。

1、讲宏观经济是讲总体、讲趋势、讲原则,讲得比较抽象,而且讲的内容是单一的经济领域。但是微观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小宏观”,微观不能讲得太抽象,必须要具体。什么叫“小宏观”?就是要讲内部的组织架构,讲人的激励与管理,讲财务与投资,讲产品与技术,讲市场与营销,有时候还要讲与政治的关系,讲与主管部门和官员的关系。企业和宏观不一样,哪个环节处理不好,都会影响赚钱。

2、宏观即使有时讲产业结构调整,讲产品升级换代,我经常讲,这与微观企业有关系,有时候关系也不大,不要太在乎。为什么?因为中国这么大,全国的GDP到2018年要达88万亿,快90万亿了。你想想,一般一个普通的微观企业产值是多少?几千万?一个亿?就算你十个亿,也仅仅占全国GDP的9万分之一,很小、很少。这么大的国家,由14亿人口的吃穿住行构成的,各行各业近三千万家企业,不要说朝阳产业,就算是夕阳产业,你只要在同行中做好“小宏观”,有明显的竞争力,照样可以赚钱,不用太在乎我们讲的那些东西。

所以我认为,企业要“低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要了解形势、看清趋势。但是最好是“三步一抬头”,“五步一抬头”,不要老抬头,不必老参加各种各样的宏观经济论坛,做企业的要有做企业的定力,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小宏观”内容上。像马云讲的,“大道理要懂,做企业家的还要回到本身,多想想自己的小道理。”我认为说得对,要各有分工,大道理让经济学家去研究,小道理你自己要管好。谢谢大家。

(2019-1-19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数里行间”的政府账单

2018年,盐城市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全市财政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聚焦“两高”目标、“三市”战略和“两海两绿”路径,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为建设“强富美高”新盐城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撑。

“数里行间”的政府大账

——带您读懂市“两会”财政预算报告

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是这样的

2018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全市财政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聚焦“两高”目标、“三市”战略和“两海两绿”路径,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为建设“强富美高”新盐城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撑。

↑ 一般公共预算

全市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81亿元** 增长 **5.8%**
- 完成年度预期目标 **100.8%**
- 税收收入 **305.1亿元** 增长 **12.2%** 税收占比 **80.1%**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40亿元** 增长 **12.3%**

市本级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7亿元** 增长 **7.2%**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8.3亿元** 增长 **8.6%**

↑ 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市

-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50.8亿元**
-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37.9亿元**

市本级

-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09.6亿元**
-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31.7亿元**

↑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市

-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亿元**
-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亿元**
-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使用 **2.7亿元**

市本级

-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7亿元**
-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0.9亿元**
-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使用 **1.5亿元**

↑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市

-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310.4亿元**
-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299.9亿元**
- 年末滚存结余 **244.1亿元**

市本级

-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56.9亿元**
-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51.4亿元**
- 年末滚存结余 **62.1亿元**

↑ 政府债务情况

- 全市政府债务限额 **1037亿元**,其中:市本级 **314亿元**
- 全市政府债务余额 **1015.4亿元**,其中:市本级 **302.3亿元**

2018年财政支持民生和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

大力支持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

- 落实增值税税率下调、企业所得税优惠扩围、涉企收费减免等政策,年内累计减轻企业负担 **30亿元**以上
- 拨付资金 **6.1亿元**,支持制造业企业升级改造和重大项目引引
- 拨付资金 **3.9亿元**,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开放型经济发展
- 拨付科技人才专项资金 **4.9亿元**,支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持续加大民生投入

- 2018年,全市财政民生支出 **651.3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77%**
 - 拨付资金 **115.5亿元**,支持推进创业就业,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提高民生保障水平
 - 拨付 **98.2亿元**,支持实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等“十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 投入财政资金 **140亿元**,支持落实国家和省市教育均衡发展政策
 - 拨付医疗卫生资金 **82.9亿元**、文化体育资金 **11.4亿元**,提高群众生活质量
 - 拨付 **25.7亿元**,支持棚户区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
- 市财政年内安排 **21亿元**,支持高铁、高速、高架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累计已承担全市铁路建设资金 **24亿元**,资本金到位率全省第一。市快速路网三期 PPP 项目完成工程量 **50%**以上,运营期节约政府付费 **32亿元**。

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

【有力有序防范债务风险】

- 研究制定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方案,统筹运用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增量财力、经营性土地出让收入、土地指标交易收入“三个20%”刚性化债的 **8**个方面措施化解政府隐性债务
- 全市争取新增债券额度 **170亿元**,总量和增量继续保持全省领先,有力保障了重大民生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大力支持精准扶贫脱贫】

全市财政累计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33.6亿元**,年内 **14.5**万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和 **37**个省定经济薄弱村实现脱贫。积极开展“正风肃纪镇村行”大走访活动,打造涉农资金监管平台,推动精准扶贫政策措施落实。

【扎实推进生态治理】

- 全市财政安排资金 **4.7亿元**,支持实施沿海百万亩生态防护林工程,绿色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 投入 **18.8亿元**,支持开展化工园区整治、“263”专项行动和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 新水源地及引水工程建设采用 PPP 模式,全周期预计节约政府付费 **40亿元**,全市近 **500**万群众饮用水安全得到保障
- 扎实做好市区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 项目前期准备,推进黑臭水体整治,改善人居环境

稳步拓展“财政+金融”发展路径

- 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12支**,协议投资项目 **48**个,投放资金 **26.6亿元**,带动社会资本投资 **97.9亿元**。其中,中韩产业园基金协议投资项目 **22**个,引导投资 **76.25亿元**,撬动社会资本投资 **59.6亿元**
- 设立总规模 **30亿元**的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智能终端等 **5支**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政府产业投资基金体系基本形成
- 在投企业中,华生基因等 **8家**挂牌,瑞孚信等 **3家**接受上市辅导
- 全市各类财政资金池累计为 **1085**户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36.9亿元**,政策性担保公司为 **1216**户企业提供担保 **110.3亿元**,为 **431**户企业提供过桥资金 **75.6亿元**

深入推进财政管理改革

- 市财政局连续 **七年**被评为省“法治财政标准化绩效管理先进单位”
- 在全省率先启动市县级财政支付方式改革
- 建立专项资金动态调整和评估退出机制,2018年市级专项资金由 **91**个压降到 **71**个,压降率 **22%**
- 预决算信息实现省市两级平台“双公开”
- **100**万元以上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实现全覆盖

2019年政府账本又是啥样呢?

↑ 一般公共预算预期目标

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06** 亿元,增长 **6.5%**
支出 **901.1** 亿元,增长 **7.3%**

市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2.6** 亿元,增长 **8.3%**
支出 **138.8** 亿元,增长 **8.2%**

↑ 政府性基金预算预期目标

全市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89.9** 亿元
支出 **358.9** 亿元

市本级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33.8** 亿元
支出 **100.7** 亿元

↑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预期目标

全市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6.5** 亿元
支出 **3.4** 亿元

市本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2** 亿元
支出 **1.8** 亿元

↑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预期目标

全市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316** 亿元,
支出 **328.8** 亿元,累计结余 **236.1** 亿元

市本级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59.1** 亿元,
支出 **53.9** 亿元,累计结余 **62.6** 亿元

2019年预算编制的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市委七届六次、七次全会精神,积极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安排四本预算,盘活用好存量资金,严控一般消耗开支,大力度整合归并专项资金,强化全程绩效管理,深入推进“产业强市、生态立市、富民兴市”,全面支持“开放沿海、接轨上海、绿色转型、绿色跨越”,为盐城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质量发展走在苏中苏北前列提供财政保障。

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

1.依法理财。贯彻落实《预算法》,收入预算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匹配,支出安排贯彻落实党委政府决策部署,严格执行各类开支标准。

2.厉行节约。按照中央和省市厉行节约各项规定,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落实中央和省不低于5%幅度压减运转经费要求,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和会议费、培训费预算。

3.资金统筹。综合使用当年财力和债券资金,加大政府性基金收入、国资经营收益使用份额,统筹安排省以上财政补助、单位非税收入和历年结余资金。

4.保障重点。先保证基本支出,后安排项目支出。人员经费、运转经费和基本民生优先保障到位。项目支出按轻重缓急,优先安排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大事项和“两重一实”项目。

5.注重绩效。树立绩效管理理念,健全绩效管理机制,对预算的编制、执行和完成结果实行全面跟踪问效,不断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益。

6.公开透明。推行预算分配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减少资金分配主观随意性,主动接受人大、审计和社会监督,建立健全预算信息披露制度和公开反馈机制。

2019年盐城财政准备怎么干?

聚力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 组建总规模 **100** 亿元的新兴产业发展基金、**30** 亿元的中韩盐城产业园二期基金
- 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星企领航”计划,落实人才激励十条政策
- 全面落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 整合做大财政资金池,力争总规模达到 **6** 亿元,引导信贷投放 **40** 亿元以上
- 规范推广 PPP 模式,支持重点工程项目建设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2019年,全市民生支出预算安排 **704.6**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的 **78.2%**。其中,教育支出安排 **152.7** 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安排 **126.1** 亿元,农林水支出安排 **109.9** 亿元,卫生健康支出安排 **85** 亿元,城乡社区支出安排 **74.4** 亿元。

- 优先支持教育事业发展
- 加大公共文化投入
-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 支持加快医疗服务改革
- 扎实推进健康盐城建设
- 加大高铁路网、空港海港、市区路桥建设等投入
- 保障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

全力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

坚决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 建立单笔5亿元以上债务“清单式”监管机制
- 实行乡镇债务上收一级管理
- 加强政府投资项目源头管理
- 规范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 大力推动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

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 全面贯彻市“富民10条”
- 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支持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
- 支持促进经济薄弱村长期稳定增收
- 全面推进低收入人口增收脱贫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 支持百万亩生态防护林建设
- 支持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和国家森林城市、国际湿地城市“双城”同创
- 深入推进“263”专项行动和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 支持化工园区改造
- 推进第Ⅲ防洪区水环境治理

不断深化财政管理改革

- 合理划分市区事权与支出责任
- 支持人大预算联网实时监督
- 实施财政支出项目资金预算绩效目标全覆盖
- 全面推进市级财政支付方式改革
- 建设盐城财政大数据中心
- 建立全口径国有资产报告制度
- 推进新实施的政府会计制度改革

(2019.1.22 盐城大众报)

中国经济需要结构调整

2018年我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元,实现了6.5%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收入水平稳定增长,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实际增长6.5%;物价水平较为平稳,CPI在2%上下波动,全年平均2.1%。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经济整体保持平稳运行实属不易。

然而,这难以掩盖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2018年四个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6.8%、6.7%、6.5%、6.4%,呈现逐渐下降趋势。6.6%的年度经济增速创下自1990年以来的新低;四季度GDP增长6.4%,也是近10年首次跌破6.5%。经过长时间高速增长和扩张,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需要正确看待增速放缓问题,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探寻经济放缓的原因,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供给端结构转型升级正在推进

从供给端来看,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由于传统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产业萎缩所致。2018年钢铁、煤炭、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的去产能任务提前完成,产能化解出清带来短期阵痛,影响了经济增速。经过测算,主要产能过剩行业如果每年化解过剩产能10%,可能直接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约0.3个百分点。但这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由此造成的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并不是坏事情。随着去产能进程持续推进,将逐渐激发经济增长新活力,形成新的供给活力。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在供给端表现得较为明显,主要存在于两个层面。

一是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18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5.8%,连续两年低于6%,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7.6%,连续7年高于

整体经济增速。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2%,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1.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9.7%,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当前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时期,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减弱,服务业的贡献度逐渐增大,推动我国从工业型经济逐渐向服务型经济转型。

二是工业产业内部结构转型升级。当前是旧动能供给走弱的末期,同时是新动能形成的初期,处于新老动能交替的关键节点。传统产能过剩行业产值增速很低甚至负增长,而新动能领域增长较快。在规模以上企业工业产值中,采矿业增加值增速只有2.3%,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增加值增速仅有-5%。初级资源能源产出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速,表明经济增长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减少,增长质量和效率提升。与此同时,高新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增长快速,推动工业产业结构优化提升。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1.7%、8.9%和8.1%,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快5.5、2.7和1.9个百分点。有的产业增长很快,微波终端机、新能源汽车、生物化学纤维、智能电视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04.5%、40.1%、23.5%、18.7%,实现两位数以上的快速增长。

需求端存在较大的消费增长潜力

从需求端来看,三大需求中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投资增速下降。201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5.9%,比上年放缓了1.3个百分点,显著低于GDP增速。从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类别来看,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制造业投资较为稳健,基建投资增速显著下行。2018年制造业投资增长9.5%,比上年度显著提升,主要原因是在过去几年限产作用下,高能耗制造业投资形成低基数,2018年出现修复式增长。房地产开发投

资增速同样高达 9.5%，其中很大原因是土地购置款大幅增长。2018 年基建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全年增长 3.8%，比上年度断崖式下降 15.2 个百分点。基建投资大幅下降是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放缓的主要原因，也是影响 2018 年经济放缓的重要原因。基建投资大幅度回落，原因在于去杠杆见效、强监管落地、地方债务管控加强、PPP 项目全面清查、环保力度加大、财政赤字率调低等宏观政策的叠加效应。

从外需来看，虽然外部环境错综复杂，但并没有影响 2018 年出口增长。2018 年出口增长了 9.9%，增速并不差。这存在应激式“抢出口”增长特征，一方面透支了 2019 年的需求，另一方面抬高了同比基数。在保护主义抬头、美国经济增速可能放缓和部分发达经济体政策不确定环境下，全球经济复苏放缓，2019 年外需走弱压力加大。受外需环境不确定性影响，2018 年三季度以来已经出现出口订单显著减少，未来出口增速可能明显下降。我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家，继续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也不现实。因此，应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

扩大内需的重点在于促进国内消费增长，近年来出台了大量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2018 年消费增长 9%，增势相对平稳。促进开放、增加进口、提高消费者福利的政策频繁出台并不断释放效力，将对消费起到提振作用。下调和取消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对整车和零部件进口关税大幅调降，通过扩大进口把消费端留在国内。个税改革稳步推进，降低个人税收负担，将对消费起到积极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存在影响消费增长的三个因素。一是近年来居民按揭贷款快速增长导致居民部门杠杆水平上升，将抑制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力，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二是房地产市场高速扩张期已过，商品房销售放缓对后续装潢、家具、家电等消费带来影响，将在 2019 年集中体现。三是随着车辆保有量上升，叠加前期刺激政策的退出，汽车类消费低位徘徊，2018 年下半年以来汽车销量持续负增长，全年增速为 -2.4%。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在需求端表现也较为明显。2018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6.2%，比上年提高 18.6 个百分点，高于资本形成总额 43.8 个百

分点，是经济增长最大的动能。我国拥有近 14 亿人口的消费市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和中产阶层的扩大，将对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形成有力支撑。随着国内消费市场的逐渐发展，存在有效供给不足问题。近年来出现明显的消费外流现象，2018 年 1-11 月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达到 1.77 万亿元，其中超过 90% 是旅行项目逆差。这反映出国内供给难以满足人民消费需求，出现供需失衡情况。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

根据全球经济发展经验，几乎所有国家达到我国当前阶段时，都面临供给和需求不平衡问题，都经历了经济增速的放缓。有的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之后达到新的供需平衡，逐渐成为高收入国家；而有的国家则供需结构长期失衡，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从供需两端来看，我国目前的问题是供给结构转型滞后于需求结构转型，导致供给和需求之间不匹配。因此，不能继续简单地追求经济规模扩张，继续保持高增速是不切实际的，而要更加注重经济质量的提升和经济效益的增长，在结构转型中实现供给和需求达到动态平衡。

实现供给和需求平衡的最有效措施是推进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我们要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对外开放。在深化改革层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相关改革走深走实。国企改革的重点要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财税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要紧密相连，2019 年将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在对外开放层面，改革的重点在于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过去对外开放主要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未来要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转变，降低制度成本，推动市场多元化发展。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供给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导致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开放才能推进供给端转型升级，实现供需之间的平衡，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2019-1-23 21 世纪经济报道)

《啥是佩奇》一夜爆红说明什么

一夜之间,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的宣传片《啥是佩奇》成了刷屏爆款。看似意料之外,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家庭是人们最深的寄托,亲情是人们最真的牵绊。每逢年关,诉诸父母子女浓烈情感的文艺作品——无论影像还是文字,都很容易触动人心,引发轰动效应。

啥是佩奇?这只其貌不扬的粉红小猪,本身就是家庭亲情的象征。一双父母、一对姐弟,简简单单、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这个“舶来品”故事,暗合了中国老百姓“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淳朴理想,也符合孩子们对童年、父母、家庭日常的真实体验。这是最基本的人伦感情,也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因此,小猪佩奇风靡全球。

当然,同是亲情,在不同的文化语境里有着千差万别的表现形式。讲好一个亲情故事,就要在共通的内核之上,用好本土化的独特表现形态和情感表达。笔者曾经跟一位美国友人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跟父母拥抱过,也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过“我爱你”。他对此简直惊掉下巴,觉得是天方夜谭。因为在他的家庭生活里,拥抱和“我爱你”都是家常便饭。

不说“我爱你”,就代表没有浓烈亲情吗?当然不是。在《啥是佩奇》里,亲人之间也没有拥抱,没有直白的言语表达。但他们行动里所蕴含的情感,却比大山深重,比大海宽广,比醇酒浓烈。留守爷爷手工打造的金属佩奇,承载着多少深切的情感?对此笔者可谓感同身受。在笔者刚参加工作时候,哥哥为笔者做了一台碗柜。用铁条焊好框架,柜底和柜顶嵌上木板,四面镶上玻璃。在柜门的地方,他细心地把玻璃磨圆滑了,以防割手。他还用玻璃胶贴上一个把手,以方便开启柜门。这样一台小小的碗柜,也许粗糙、笨重,不如花钱买来的精致、美观,但在笔者心目中,它却无比珍贵。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古往今来,多少诗篇都为亲情书写。它是我们民族文化最深层的基因,是我们心底最柔软、最珍贵的部分。以此为根脉,生发出美好的家庭伦常、道德观念和情感取向,最终构筑起我们须臾不离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

这种情感没有远去。在一位留守山村的老年农民,以及一位以动漫为伴的城市孩童之间,通过佩奇为纽

带,他们在情感世界里得以联结。这份朴素而浓烈的情感,也在祖孙三辈人之间得以传承。推而广之,这部短片令无数人热泪盈眶,激活了人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情感,得以体验价值、文化和情感共同体的洗礼,这正是艺术作品的力量和价值所在。

当然,一则短短几分钟的商业广告,远远无法承载我们真实的日常和情感重量。《啥是佩奇》的爆红,也是对文艺工作者的一声追问:有没有意愿把创作的目光投向现实生活,有没有能力挖掘和诠释真实的故事,表现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情感张力?须知,乡与城、父与子、传统与现代,这些几乎是国人生活中面临的“元命题”,却只在年复一年的返乡期才成为短暂的话题焦点。

这些“元命题”所蕴藏的内涵,远比《啥是佩奇》以及每年一度的“返乡爆文”所表现得复杂、厚重、充满张力。留守爷爷一片挚爱背后,有着更多辛酸苦涩。代际之间的情感指向,也不是那么平面和单向。甚至过年本身,对于不少人来说也并非快乐团圆那么简单。一顿团圆饭,浓缩着更多的欢欣和悲苦,包含着人生和生活的百味杂陈。

这些重要的命题,呼唤着更深刻、更有力的艺术创作。直面它们的优秀作品,将可以触动情感、抚慰人心,赋予人们风雨兼程的精神力量。多年以来,《功夫熊猫》成了爆款,《花木兰》被反复演绎。这些我们无比熟悉的文化语境和故事,却被好莱坞电影反复言说。现在,《啥是佩奇》的一夜爆红,再次清晰无误地标出了人们的情感所依。而它,或许也正是文艺创作的方向所指、路径所在。

(2019-1-22 光明日报)

